

· 主题讨论 ·

摩洛哥对以色列“接触政策”中的 犹太人因素考察*

张玉友

内容提要 少数民族问题是多民族国家外交政策制定中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作为摩洛哥的少数民族，犹太人在历史上与当地主体社会建立了密切关系，获得的“被保护民”地位为犹太社团在摩洛哥及其对外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1956年独立至今，摩洛哥与以色列关系经历了有限接触、正常化接触、秘密接触和双边关系正常化4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外交政策选择都是王室与犹太社区动态互动的结果。犹太社区通过犹太社会精英的积极游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动员以及美国犹太集团的间接推动等路径，影响摩洛哥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摩洛哥王室在平衡风险与收益的情况下，通过国际犹太社区为摩洛哥获取以色列的战略资源援助。作为全球最大的跨族群之一，犹太人将继续在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 摩洛哥与以色列关系 接触政策 少数民族 摩裔犹太人 巴以冲突

作者简介 张玉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后（西安 710069）。

自20世纪中叶民族解放运动和全球移民浪潮兴起以来，族群或族裔政治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议程之一。在冲突频发的西亚北非地区，少数民族甚至成为一些国家推动内政与外交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伊朗的俾路支人、叙利亚的库尔德人、马里的图阿雷格人都是所在国周边外交政策核心考量因素之一。同样作为少数民族，犹太人以社区的形式活跃于美国、法国、俄罗斯、

* 本文系第66批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2019M663806）和西北大学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孵化计划”项目“摩洛哥外交决策模式及其对华政策影响研究”（20XNZX00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西亚非洲》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伊朗和摩洛哥等国。1948年以色列建国，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反犹宣传和阿以战争的渲染下，世界各地犹太人对以色列国的生存产生了深切的忧患感。^①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犹太社区通过多重途径影响移居国外交政策，以改善以色列的外部环境。

当前，学界对犹太社区与一国外交政策的关系研究，多集中于犹太人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探讨。^②具体而言，它指犹太利益集团试图通过游说的方式，在美国塑造及强化一种政治或文化认同，推动美国政府制定支持以色列的各种政策，促使以色列在地区冲突中处于有利位置。^③此外，俄裔犹太人对俄以关系的影响也受到了较多关注，^④但是关于阿拉伯国家犹太社区对阿以关系影响的研究成果寥寥可数。^⑤

近年来，阿以关系出现新变化，以色列通过各种努力试图打破与阿拉伯国家的僵持关系。2018年10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历史性地访问阿曼，以色列陆续与卡塔尔、埃及、苏丹、摩洛哥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形成缓和氛围。^⑥2020年8月、9月、10月和12月，以色列先后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达成历史性的关系正常化协议。目前，学界对于阿以缓和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第一是经济发展说。该观点认为，阿拉伯剧变后，诸多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以油气资源为主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均将“非油气”产业作为

① 张礼刚、宋瑞娟：《“六日战争”对美国犹太族群认同的影响》，载《史学月刊》2020年第3期，第71页。

② See Robert H. Trice,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Foreign Policy Process: US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76;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8; Keith Peter Kiely, *U. S.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 and the Israel Lobby: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sraeli - Palestinian Peace Process*, New York: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 潘光、汪舒明、罗爱玲主编：《犹太人在美国：一个成功族群的发展和影响》，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杨阳著：《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关系研究》，中西书局，2016年版。

③ Mohammed Turki al - Sudairi, “Israel - Sino Relations Through the Prism of Advocacy Groups”, *HH Sheikh Nasser al - Mohammad al - Sabah Publication Series*, No. 6, 2013, p. 3.

④ 王琼：《俄罗斯对以色列外交战略及未来趋势》，载《学术探索》2019年第8期，第42~50页；Robert O. Freedman, Russia, “Israel and Arab - Israeli Conflict: The Putin Year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17, No. 3, 2010, pp. 51 - 63.

⑤ 国内学界曾有零星的研究，参见赵建成：《阿以和谈与摩洛哥犹太人》，载《世界知识》1987年第1期，第22~23页。

⑥ Herb Keinon, “Netanyahu after Oman Visit: There will be Other Such Visits”, *Jerusalem Post*, October 2018.

发展战略,而以色列正是这一战略的极佳合作伙伴。^①第二是地缘政治说。该观点认为,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改善关系主要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化,具体来说是“出于对自身面临安全威胁的重新排序,以及‘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结盟逻辑”。^②第三是美国因素说。该观点认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缓和关系一方面受到美国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在阿以关系上让步来获取美国的安全保护。^③上述三种观点都属于宏观上的解读,缺乏微观视角下的观察,如不能解释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之前,为何这些阿拉伯国家能够与以色列保持着非正式接触关系。

在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中,犹太社区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尤其是与以色列长期保持稳定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如位于北非地区的摩洛哥。摩洛哥与以色列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之前,两国就存在长期的接触关系。在2011年宪法修订中,摩洛哥首次将犹太元素写入宪法,以作为多元文明的一部分,充分彰显了两国文化的亲近性。^④独立以来,摩洛哥在争取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基础上,一直保持着对以色列的接触政策,其中缘由值得深入研究。

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一般是指“国际体系中的现状国家应对崛起国时,通过非强制性手段,旨在将崛起国融入既有国际秩序中并加以改造的一系列外交政策。”^⑤实际上,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中小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执行“接触政策”的现象。例如,长期以来,以色列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关系均处于敌对与正常的中间状态,作为外交政策的一种分类,“接触政策”是双方最常用的“交流途径”。本文的“接触政策”主要是指长期处于敌对与正常中间状态的国家对彼此实施的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的的政策选项。在这

^① Dov Lieber, “Israel, U. A. E. Pursue Economic Ties in Wake of U. S. - Brokered Breakthroug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israel-u-a-e-pursue-economic-ties-in-wake-of-u-s-brokered-breakthrough-11598989870>, 2020-09-07.

^② Clive Jones and Yoel Guzansky, *Fraternal Enemies: Israel and the Gulf Monarch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丁隆:《阿以建交,“新中东”的风向标》,载《环球时报》2020年8月15日;王晋:《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促进中东新格局》,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17期,第52~53页。

^③ Omar H. Rahman, “What’s Behi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rael and Arab Gulf states?”, *Brookings*, January 28,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9/01/28/whats-behind-the-relationship-between-israel-and-arab-gulf-states>, 2020-09-07.

^④ 参见摩洛哥2011年《宪法》前言, <https://mjp.univ-perp.fr/constit/ma2011.htm#pr>, 2021-03-07.

^⑤ 刘舒天:《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为何曾长期延续?》,载《外交评论》2019年第3期,第88页。

种双边关系中，共同族群是推进“接触政策”的重要基础。

摩洛哥对以色列“接触政策”案例兼具典型性与独特性，前者在于摩洛哥对以色列的“接触政策”体现了目前阿以关系中的普遍特征，后者主要表现在犹太人在摩洛哥外交政策中的多元化影响路径，以及王室与犹太人的独特历史关系。鉴此，本文选取摩洛哥与以色列关系作为案例，基于历史与现实，剖析犹太人^①在摩洛哥对以色列“接触政策”中的作用，以期揭示当前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发展类型，以及双边关系缓和现象的内在动因。

一 少数民族与“接触政策”：一种理论范式

一般而言，根据人口规模的大小和社会地位的高低，族群可以分为少数民族和多数族群，前者已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如中东的库尔德问题、巴勒斯坦的俾路支问题、马格里布地区的柏柏尔问题、美国的古巴裔移民等。学界对少数民族的定义，多是以静态的人口结构为基础，本文采用罗杰斯·布鲁贝克尔（Rogers Brubaker）归纳的动态式特征，即少数民族“并不仅仅是由人口统计事实所决定的一个群体。它还是一种处于变化之中的政治立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系列相关但相互对立的立场，而不是一种静态的人种和人口状况。”^②事实上，只有那些持共同或者相似政治立场、拥有强烈的共同身份认同的少数民族才能够与国家的内政、外交进行互动，即有能力和意愿对移居国施加影响。从国际范围看，少数民族与“接触政策”互动的案例多出现于存在犹太社区的阿拉伯国家（也包括其他伊斯兰国家）。

从理论上讲，少数民族如何与一国“接触政策”产生互动？这里的“互动”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作为国内政治议程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一国外交政策中的“接触政策”？其二，一国外交决策制定者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少数民族拓展外交成果？根据现有研究，本文将国际关系或者外交政策分析领域中关于少数民族和“接触政策”互动的研究归纳为以下两类：

^① 这里的犹太人群体主要是指摩洛哥境内的犹太社区，以及与之有关联的国际摩洛哥裔犹太人，如以色列、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摩裔犹太人。

^②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60.

第一类是“利益集团论”。该类研究将少数民族群视为另一种“利益集团”，其寻求对移居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少数民族群被认为是现任政治领袖或当局反对者的潜在支持者。在这一概念中，少数族裔容易受到动员和操纵，特别是在民主国家，可能导致少数族裔游说团体开展“捕捉政策”（Policy Capture）。^① 此类研究主要的实证案例是基于美国的特定背景，分析一些有影响力、有组织的少数民族群流散群体（如古巴、亚美尼亚和美国的犹太人团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② 其核心观点是，这种游说在美国十分有效，它总是能“捕捉”到美国外交政策的相关方面，如维持对古巴禁运、巴以问题中偏袒以色列、限制美国与阿塞拜疆交往等。^③ 由此看出，如果少数民族群能够集中力量使移居国大部分人倾向于其政策偏好时，则会对移居国的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类是“跨国族群联盟论”。这类研究将少数民族群作为国家间冲突的一种解释变量，认为生活在多个（两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同一少数民族群是“族群政治”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主体。^④ 根据该理论，由同一少数民族群组成的“跨国族群联盟”会影响某一国家的“接触政策”行为，即国家—族群关系呈现出以下模式：某一族群在A国处于支配或“特权”地位，而在B国处于弱势或受迫害时，国家A和B就有可能爆发冲突。如果少数民族群在A、B两国处境的差异性变大时，冲突的预期也会随之增长。^⑤ 例如，20世纪70年代，索马里试图统一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境内的索马里人，建立

① Michael Clarke, “The Impact of Ethnic Minorities on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Xinjiang and the Uyghur”, *China Report*, Vol. 53, No. 1, 2017, p. 4.

② Stephen M. Saideman, “The Power of the Small: The Impact of Ethnic Minorities on Foreign Policy”, *SAIS Review*, Vol. 22, No. 2, 2002, pp. 93 – 105.

③ Patrick Haney and Walt Vanderbush, “The Role of Ethnic Interest Groups in US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the Cuban American National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2, 1999, pp. 341 – 361; John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Walt,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8; Will H. Moore, “Ethnic Minorities and Foreign Policy”, *SAIS Review*, Vol. 22, No. 2, 2002, pp. 71 – 91; 李庆四:《试析少数民族群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载《国际论坛》2004年第4期,第1~6页; Trevor Rubenzer, “Ethnic Minority Groups and US Foreign Policy: Examining Congressional Decision Making and Economic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4, No. 3, 2010, pp. 755 – 777.

④ Michael Clarke, *op. cit.*, p. 5.

⑤ David Davis and Will Moore, “Ethnicity Matters: Transnational Ethnic Alliances and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 1997, pp. 171 – 184.

“大索马里”，最终导致1977~1978年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战争，战争的爆发与索马里境内拥有特权地位的欧加登集团（Ogaden）对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Mohamed Siad Barre）的游说有关。^①

关于“跨国族群联盟论”，除了对冲突的解释性研究，还涉及变体后的合作性研究，即什么条件下，跨国族群关系会促进国家间合作？最新研究表明，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取决于每个国家对有关跨国族群的“威胁认知”和“友善认知”。例如，美国明德学院政治系助理教授加里·温斯勒（Gary Winslett）博士提出“威胁认知差异”模式，即“当A国和B国同时认定X组织是威胁势力时，A、B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增加；当A、B两国中，一方视X组织为威胁势力，另一方视其为非威胁对象，且其中一方寻求合作遭到另一方拒绝时，两国合作的可能性降低”。^②同理，当A、B两国均将该组织视为友善对象时，两国的合作水平也会随之提升。

犹太人作为跨国族群的典型群体，也符合上述两类研究，即同时扮演“利益集团”和“威胁/合作对象”两种角色。根据《2018年美国犹太人年鉴》统计，2018年初，全球犹太人超过1460万，主要集中在北美、西亚、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其中北美与以色列占比超过84%，欧洲占9%，拉美地区占3%。^③从社会角色来看，犹太人在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法国等大国均有着较为强大的影响力，这不仅体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还体现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它是西方国家典型的以某一族群为内核的“利益集团”。在阿拉伯国家，犹太人数量自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逐年减少，至2018年，犹太人主要分布在北非的摩洛哥（2150人）、突尼斯（1050人）、埃及（100人）等国，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均低于100人。^④尽管如此，近年来，犹太人在摩洛哥、突尼斯、阿联酋和巴林等国均形成了不可忽视的犹太社区，他们与各国政治精英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其社会角色是一种发展中的“利益集

^① Stephen M. Saideman, “The Power of the Small: The Impact of Ethnic Minorities on Foreign Policy”, *SAIS Review*, Vol. 22, No. 2, 2002, p. 102.

^② Gary Winslett, “Differential Threat Perceptions: How Transnational Groups Influence Bilateral Security Relation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2, No. 4, 2016, pp. 653–673.

^③ Sergio Della Pergola, “World Jewish Population, 2018”, in Arnold Dashevsky Ira M. Sheskin, ed.,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2018: The Annual Record of the North American Jewish Communities Since 1899*,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9, pp. 440–449.

^④ Ibid.

团”。这些犹太社区游说的共同目的是改善移居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态度和政策。另外，由于犹太人在各阿拉伯国家有着不同的地位，如在摩洛哥、突尼斯、阿曼等国被视为友好的少数民族，而在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则被视为敌对的少数民族，所以这种认知极大地影响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同时也形塑了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威胁/合作对象”角色。

二 “被保护民”地位与历史上犹太人在摩洛哥 对外关系中的作用

作为犹太人流散的居住地之一，摩洛哥曾是阿拉伯世界容纳犹太人最多的国家。据犹太学者安德烈·列维（André Levy）统计，1946年，在摩洛哥境内犹太人第一次向以色列大规模移民（1948~1949年）之前，摩洛哥犹太人就达到了25万。^①1960年，摩洛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犹太人口仍有16.24万人，主要集中在卡萨布兰卡、拉巴特、非斯、丹吉尔、得土安、塞夫鲁和索维拉等大中型城市。^②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口整体出现锐减趋势，摩洛哥犹太人也逐渐减少。

从摩洛哥犹太人的历史嬗变来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是古代至近代时期（1912年之前）。在犹太人的历史书写下，摩洛哥犹太人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腓尼基时期。^③据考古铭文资料显示，犹太人在摩洛哥最早的活动地点位于公元2世纪罗马统治的瓦卢比利斯（Volubilis）地区。^④有学者认为犹太人向摩洛哥的移民出现过两次高潮：公元前70年第二

^①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得土安地区的犹太人在独立前未进行过详细的人口普查，因此对于摩洛哥犹太人口的高峰值一直存在争议。See Andre Levy, “Homecomings to the Diaspora: Nation and State in Visits of Israelis to Morocco”, in Fran Markowitz, Anders H. Stefansson, eds., *Homecomings: Unsettling Paths of Return*,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4, p. 95.

^② 有学者估计，得益于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1960年摩洛哥的犹太人口可能达到27万。See “The Jews in Morocco”, February 1968, Ref: FCO: 39/151 - 106348, Confidential, PRO, British Consulate General, Restricted, Casablanca.

^③ 约公元前361年建南部城市伊芙兰（Ifren）的犹太社区被视作最早的摩洛哥犹太社区。See Emily Gottreich, *Jewish Morocco: A History from Pre - Islamic to Postcolonial Times*, London: I. B. Tauris, 2020, p. 39.

^④ Yann Le Bohec, “Inscriptions Juives et Judaïques de l’ Afrique Romaine”, *Antiquités Africaines*, Vol. 17, No. 1, 1981, pp. 165 - 207.

圣殿毁灭时期和1492年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Sephardic）出逃时期。^① 这一时期的犹太人在马格里布地区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社会地位以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自公元788年，摩洛哥第一个伊斯兰王朝——伊德里斯王朝（Idrisid Dynasty）建立后，犹太人在伊斯兰法体系下获得了特殊的“迪米/保护民”（Dhimma）身份，即受伊斯兰教保护的其他宗教人士。^② 犹太人社区内部也形成了独特的法律体系，即以等级分明的拉比为核心，推行宗教仪式和法院事务。^③ 1438年，第一个摩洛哥犹太区——“麦拉”（Mellah）在非斯新城建立。^④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央政府与犹太人开始建立了特殊的保护关系。这种保护关系主要体现在对宫廷犹太人（Court Jews）的角色定位：犹太人担任苏丹及其王室的商务和外交代表，主要负责处理与欧洲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⑤ 中世纪萨阿德王朝时期（Saadi Dynasty, 1549~1659年），犹太人开始较为广泛地在宫廷中担任财政大臣、外交代表、医生和翻译等重要职位，其中犹太贵族卡伯萨（Cabessa）和帕拉切（Palache）家族曾作为苏丹与欧洲商人谈判的代表出使欧洲。^⑥ 阿拉维王朝时期（Alawite Dynasty, 1668年至今），犹太人约瑟夫·托莱达尼（Joseph Toledani）和摩西·本·阿特耳（Moses Ibn Attar）作为苏丹全权代表分别与荷兰（1690年）和大英帝国（1721年）缔结和平协议。^⑦ 宫廷犹太人在外交部门任职的传统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19世纪，由于摩洛哥持续动荡，犹太人常被当做欧洲侵略者的替罪羊，他们在王室中的作用逐渐被弱化。

第二是法国保护国时期（1912~1956年）。1912年，法国殖民政府取代

① Michael M. Lasier, *North African Jew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Jews of Morocco, Tunisia, and Alger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1.

② Germaine Ayache, “La Minorité juive dans le Maroc Précolonial”, *Hespéris - Tamuda*, Vol. 25, No. 1, 1987, p. 149.

③ Michael M. Lasier, *op. cit.*, pp. 13 - 14.

④ 阿拉伯学者和西方学者在看待“麦拉”区建立的目的上存在较大分歧，前者认为这是苏丹为了保护犹太人而采取的措施，而西方学者尤其犹太学者认为这种措施是压迫犹太人的表现。See Lhaj Mohamed Nacik, “The Emigration of Moroccan Jews to Palestine After the Six - Day War: A Report by Mr. P. M. Johnston the British Consul, Casablanca (February 1968),” *Hespéris - Tamuda*, Vol. 53, No. 3, 2018, p. 196.

⑤ Michael M. Lasier, *op. cit.*, pp. 17 - 18.

⑥ 参见犹太虚拟图书馆网站：<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sa-x0027-dis>, 2020-11-10.

⑦ 参见犹太虚拟图书馆网站：<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morocco-virtual-jewish-history-tour>, 2020-11-10.

摩洛哥苏丹的行政权后，第一任总督罗贝尔·利奥泰（Robert Lyautey）采用了与古代摩洛哥政府相似的民族政策，即以“保护”政策为核心，同时平衡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犹太人的地位差异。在该政策影响下，犹太人的安全环境得到改善，但更多特权诉求的实现变得尤为困难，如获取法国国民身份和扩大“世界以色列联盟”等。^① 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纳粹党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反犹太主义情绪在欧洲大陆蔓延，北非地区也受到牵连。1940年，法国维希政权接管摩洛哥后，犹太人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其诸多权利被限制，如大量犹太民事和刑事案件改由苏丹任命的伊斯兰大法官执行。^② 1948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正式建国，激怒了世界穆斯林群体，同年在摩洛哥北部城市乌季达（Oujda）和杰拉达（Jerada）等地爆发了大规模反犹运动。但是，摩洛哥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公开表示反对这种不加区分的反犹运动，继续维持阿拉维王朝延续下来的“保护”政策。^③ 在反纳粹主义左翼运动与王室“保护”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一些摩洛哥犹太人积极参与摩洛哥反殖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④ 他们通过全球犹太人网络协助摩洛哥民族主义者在纽约和巴黎等地开展外交游说活动。

第三是摩洛哥王国时期（1956至今）。自1948年起，摩洛哥犹太人的核心议程转变为向以色列移民。但1956年摩洛哥独立后，独立党（Istiqlal Party，1958~1960年摩洛哥政府执政党）反对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认为这会破坏摩洛哥的主权统一。^⑤ 1961年亲犹太人的哈桑二世继位，于1965年全面掌权后，犹太人的移民运动得以继续。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由于遭到摩洛哥穆斯林民众的敌视，犹太人的移民诉求高涨。在哈桑二世的“幕后”帮助下，大量摩洛哥犹太人顺利移民至以色列。^⑥ 1971年，摩洛哥犹太人口减少至3.5万人。摩洛哥犹太人在向以色列移民的同时，也将欧洲和

① Michael M. Lasier, op. cit., p. 28.

② Mohammed Kenbib, “Moroccan Jews and the Vichy Regime, 1940 – 42”,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9, No. 4, 2014, pp. 540 – 553.

③ Maite Ojeda – Mata, “Moroccan Jewish Emigration in the Age of Independence Movement: A Reappraisal”, *Hesperis – Tamuda*, Vol. 50, No. 3, 2018, pp. 145 – 163.

④ Alma Rachel Heckman, *The Sultan’s Communists: Moroccan Jews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0 – 11.

⑤ Michael M. Lasier, op. cit., p. 55.

⑥ “The Jews in Morocco”, February 1968, Ref: FCO: 39/151 – 106348, Confidential, PRO, British Consulate General, Restricted, Casablanca.

北美作为移居目的地。21 世纪以来，摩洛哥境内犹太人数量下降至 1 万人以下。

据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摩洛哥犹太人约为 2 150 人，居于阿拉伯国家之首，在中东仅次于土耳其和伊朗的犹太人数量（分别为 15 000 人和 8 500 人）。^① 犹太人活跃于摩洛哥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各个领域。2018 年 2 月，世界犹太人大会在最新报告中将摩洛哥犹太社区定位成“北非地区现存的最大犹太社区”。摩洛哥设有世界犹太人大会附属机构“摩洛哥以色列社区理事会”（Conseil des Communautés Israélites du Maroc）。^② 虽然摩洛哥现仅有 2 000 多犹太人，但是在海外具有摩洛哥背景的犹太人接近百万。2007 年，有学者统计，仅在以色列 620 万人口中，就有 80 万人具有摩洛哥血统，其中 15.65 万人出生在摩洛哥。^③ 国际摩裔犹太人与摩洛哥境内犹太社区组成了摩洛哥特殊的犹太少数民族群。为推动摩洛哥对以色列政策的开展，该群体借助摩洛哥境内犹太精英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

综上所述，无论在哪一时期，摩洛哥苏丹或国王及其王室对犹太人的政策都一以贯之，即以“保护”政策为主。犹太人也长期作为少数民族群在摩洛哥对外交往中扮演积极角色。穆罕默德六世继位后，摩洛哥延续着对犹太人的友好政策。虽受巴以冲突影响，但全球摩裔犹太人群体仍然活跃于摩洛哥，并在经济、内政与外交等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以色列摩裔犹太人每年仍然通过“朝觐”的方式回到摩洛哥。摩洛哥与以色列之间的“犹太人联系”为日后双边“接触政策”的开展奠定了现实基础。

三 从接触到关系正常化：摩洛哥与以色列关系的嬗变

摩洛哥与以色列的接触关系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当时刚独立的摩洛哥

^① Judy Maltz, “World Jewish Population on Eve of New Year – 14.7 Million”, *Haaretz*, September 9, 2018, <https://www.haaretz.com/jewish/.premium-world-jewish-population-on-eve-of-new-year-14-7-million-1.6464812>, 2020-09-08.

^② 参考世界犹太人大会官方网站：<http://www.worldjewishcongress.org/en/about/communities/MA>, 2019-06-07.

^③ Emanuela Trevisan – Semi, “La Mise en Scène de L’identité Marocaine en Israël; Un Cas d’ ‘Israélianité’ Diasporique”, *A Contrario*, Vol. 5, 2007, p. 39.

哥和建国不久的以色列均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20世纪下半叶,摩洛哥与以色列的接触经历了从小范围的有限接触发展到接近于建交的正常化接触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受中东地缘政治急剧变化的影响,摩以关系退化,进入秘密接触阶段。2016年以来,在穆罕默德六世外交战略转向的大背景下,摩洛哥与以色列开展了诸多间接接触,并在摩洛哥国家利益主导下实现了摩以关系正常化。

(一) 有限接触

1948年以色列建国不久,为解决安全困境,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提出了针对中东的“边缘政策”,即发展与伊朗、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等非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到1953年,本-古里安在一次对以色列军方的演讲中称,“以色列不会仅限于与特定地区或国家发展关系”。^①当时,以色列外交部官员就关注到北非地区具有发展外交关系的潜力,而摩洛哥地处地中海西南角,远离巴以冲突的核心地带,且境内有大量犹太人并与中央政府(特指王室)保持较好关系,正好符合以色列的外交战略需求。^②1953年,以色列著名军事领导人摩西·达扬(Mose Dayan)密访摩洛哥后,正式提议以色列政府与摩洛哥建立外交关系。1961年,哈桑二世继位后对内面临民族主义反对派的威胁,对外因领土问题与阿尔及利亚爆发局部战争。在此情况下,哈桑二世放弃了前任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泛阿拉伯主义政策,继而转向沙特领导的亲西方阵营以寻求帮助。^③此时起,哈桑二世开始对以色列实施以情报合作为主的有限接触政策。^④

1967~1973年,受摩洛哥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影响,哈桑二世对以色列政策也受到了冲击。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1971年和1972年两次未遂军事政变,以及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相继爆发,一方面使摩洛哥支持巴勒斯坦和反以色列的情绪大涨,另一方面因政变导致的政权危机,哈桑二世不得不向国内左翼势力妥协。从国内舆论、政党、工会组织到政府内部大臣均无一不表达对巴勒斯坦处境的同情,因此这一时期哈桑二世也顺应形势,积

① David Ben Gurion, *Army and Security* [Hebrew], Tel Aviv: Ma'arakhot, 1955, pp. 350-358.

② Abba Eban,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7, pp. 146-147.

③ Samuel Segev & Yvette Shumacher, "Israel - Morocco Relations from Hassan II to Muhammad VI", *Israel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Vol. 2, No. 3, 2008, p. 50.

④ Jacob Abadi, "The Road to the Israeli - Moroccan rapprochement",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5, No. 1, 2000, pp. 27-54.

极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时在外交上谴责以色列，在军事上^①派兵参与阿拉伯联军对抗以色列。^②然而，在高调的亲巴和反以话语下，哈桑二世依然保持着 20 世纪 60 年代王室与以色列合作的水平，实际上实施的是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两面接触”政策。

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西撒哈拉问题^③开始成为哈桑二世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在摩洛哥犹太人的游说和支持下，两国高层在以色列和其他场合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由于以色列积极为哈桑二世提供急需物资，两国关系也迅速升温。为回报以色列提供的巨大帮助，哈桑二世还邀请移居以色列的摩洛哥犹太人还乡。^④1975 年夏季，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第一次以官方身份访问摩洛哥。1976 年 10 月，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秘密访问摩洛哥，欲通过哈桑二世与埃及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建立联系。在得知萨达特有意与以色列开启对话的决定后，哈桑二世公开支持该决定，并称“必须尝试（阿以）共存，因为目前的事态对世界和平构成持续的威胁。”显然，哈桑二世仍然保持着谨慎务实的态度，同时也表现出对以色列的友好政策取向。^⑤1977 年 9 月，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达扬连续两次访问摩洛哥，就阿以进行双边和谈的可能性进行探讨。据当时在场的以色列记者塞缪尔·塞格夫（Shmuel Segev）记录，哈桑二世公开称阿拉伯国家应该承认以色列。^⑥

因频繁接触以色列，哈桑二世遭到国内外反犹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人士的批评。在此压力下，1978 年 9 月《戴维营协议》签署后，哈桑二世转而批评

① 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摩洛哥仅是象征性派兵，而第四次中东战争则常规化派兵。

② Jérôme Van Ruychevelt,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u Maroc envers Israël, Acteurs et Facteurs Déterminants: Une Mise à Jour Théorique (2000-2010)*, Casablanca: Dictus Publishing, 2012, pp. 35-42.

③ 参见卢秋怡：《西撒哈拉问题的演化、影响及症结》，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137~156 页。

④ Jacob Abadi, “The Road to the Israeli - Moroccan Rapprochement”,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5, No. 1, 2000, p. 39.

⑤ “Press Interview Statements by King Hassan of Morocco Calling for Peace with Israel and Emphasizing that Recognition of the PLO Will Discourage Extremism in the East, (excerpts), Rabat, mid - November, 1977”,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on Palestine, 1977*, in *Beirut: Institute of Palestine Studies, 1979*, No. 286, p. 410.

⑥ “‘No More War’: The Begin Government’s Peace Initiative and Sadat’s Visit Jerusalem”, November 1977, Israel State Archives, <https://catalog.archives.gov.il/en/chapter/no-war-begin-governments-peace-initiative-sadats-visit-jerusalem-november-1977>, 2021-01-21.

埃及总统萨达特，但同时坚持认为解决中东和平问题应采用政治路径。^①摩洛哥虽坚持“阿拉伯事业”统一战线的立场，但哈桑二世仍保持与以色列的秘密接触。1981年在沙特提出“法赫德方案”草案后，次年在哈桑二世的主持下，第一个致力于解决阿以冲突的“非斯方案”最终确定。^②为了落实“非斯方案”，哈桑二世积极开展对以色列外交，并积极游说国内外犹太人支持摩洛哥的地区政策。^③1986年7月，在西蒙·佩雷斯即将卸任以色列总理之际，哈桑二世主动邀请他访问摩洛哥，双方在伊夫兰皇宫进行了会谈。

（二）正常化接触

佩雷斯与哈桑二世会谈后，摩洛哥对以色列外交进入了新阶段，即正常化接触阶段。20世纪80年代起，在犹太人的大力帮助下，以色列对摩洛哥投资额大幅上升。首先体现在旅游行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摩裔犹太人“返回”摩洛哥旅游的人数达到高峰，这不仅提升了摩洛哥的国际形象，而且增加了外汇储备；其次是农业领域，以色列为摩洛哥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如灌溉技术）和大量的投资项目，如以色列工程师在摩洛哥建立了“示范农场”、以色列公司在摩洛哥投资了花卉和蔬菜产业，仅在杰迪达（Jadida）的投资额就达50万美元。^④据统计，在1993年未取得重大外交突破的情况下，摩以双边贸易额已达1亿美元；^⑤最后是国防领域，在军事人员培训和技术支持方面，以色列为摩洛哥国防建设做出了独特贡献。^⑥

1993年，以色列和巴解组织达成历史性的《奥斯陆协议》。借助阿以关系改善的机遇，哈桑二世加大对以色列接触力度。1994年，为促进摩以合作，哈桑二世任命摩洛哥犹太人塞日·贝杜果（Serge Berdugo）为旅游大臣。作为摩洛哥犹太社区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和领袖，贝杜果在任内为摩以关系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主要体现是促进摩以双方互设具有外交性质的“联络处”（Liaison Office）。1995年，特拉维夫—拉巴特“联络处”建立，标志

① Jacob Abadi, op. cit., pp. 41-42.

② Jérôme Van Ruychevelt,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u Maroc envers Israël, Acteurs et Facteurs Déterminants: une Mise à Jour Théorique (2000-2010)*, p. 45.

③ Michael M. Laskier, "Israeli - Moroccan Relations and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1977 - 2002", *Israel Affairs*, Vol. 10, No. 3, 2004, p. 52.

④ "Voice of Israel External Service", *Jerusalem*, in English, 22 January 1994, SWB.MEW/0318 WME/13, 1 Feb. 1994, Ha' aretz (Tel Aviv) May 2, 1993.

⑤ Cited in MEED (Middle East Business Weekly) 38/37, 16 September 1994, p. 26.

⑥ Samuel Segev & Yvette Shumacher, "Israel - Morocco Relations from Hassan II to Muhammad VI", p. 53.

着摩洛哥对以色列的外交达到了正常化接触阶段。^①

尽管巴以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但出于务实主义外交考量，哈桑二世选择了谨慎而大胆的外交行为。与哈桑二世相比，穆罕默德六世在外交上显得较为低调、谨慎与远离国际政治圈，^②但他对以色列政策基本上延续了哈桑二世执政末期的状态。在哈桑二世的正常化接触政策下，摩洛哥与以色列关系在1992~1995年达到历史顶峰。

（三）秘密接触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哈桑二世身体状况恶化、摩洛哥国内左翼政党开始执政^③以及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上台，舆论对于摩以关系的持续发展持悲观态度。与此同时，阿以和平进程再一次陷于僵局，《奥斯陆协定》岌岌可危，叙利亚与以色列谈判进入停滞状态。尽管如此，摩洛哥和以色列的关系特别是在情报和国防领域，一直未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干扰和阻断。

1997年，为平息摩洛哥国内和阿拉伯世界反对与以色列过度交往的声音，哈桑二世取消了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外交部长戴维·列维（David Levy）访问摩洛哥的邀请，同时还拒绝以色列提供的任何援助。在地缘政治新形势下，摩洛哥和以色列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计划的许多经济项目被冻结。该时期除了人员流动外，摩以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出现了倒退。1999年7月23日，哈桑二世去世的消息震惊了以色列政府，^④以方对即将继位的新国王是否有能力和意愿继续维持摩以关系深表担忧。穆罕默德六世继位初的几项行动也证实了以方的担忧，如罢免与以色列具有亲密关系的内政大臣得利斯·巴斯里（Driss Basri），赦免反犹太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夫拉罕·萨法提（Avraham Sarfati），并任命其为国家能源发展部首席顾问。^⑤

^① Michael M. Laskier, "Israeli - Moroccan Relations and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1977 - 2002", pp. 62 - 63.

^② Mustapha Tossa, "Le Cru de la Diplomatie Marocaine en 2001", *Maroc Hebdo International*, No. 492, 2001, p. 10.

^③ 20世纪90年代，哈桑二世开始与以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UFSP）为主的左翼达成妥协，进行“政权改组”，而左翼政党是摩洛哥国内反犹的主要势力之一。

^④ 在哈桑二世的葬礼上，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携100名左右政府官员及社会人士参加吊唁。“Moroccan Jews Mourn the Passing of King Hassan II”, *The Jewish News of Northern California*, July 30, 1999, <https://www.jweekly.com/1999/07/30/moroccan-jews-mourn-the-passing-of-king-hassan-ii>, 2020-09-21.

^⑤ Michael M. Laskier, "Israeli - Moroccan Relations and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1977 - 2002", pp. 68 - 69.

但从穆罕默德六世执政的具体政策来看，摩洛哥仍延续着哈桑二世时期对以色列的接触政策。即在巴以冲突的政治环境下，摩洛哥在官方层面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人民一样坚定地站在“巴勒斯坦事业”一边，但同时通过摩裔犹太人与以色列维持着“非正式的合作与联系”。以色列游客和从事特殊农业和工业项目的专业人员继续正常进入摩洛哥。为减少巴以冲突带来的潜在影响，如遭到摩洛哥官方的制裁，由以色列资助摩洛哥商人建立的从事农业开发、灌溉设备和医疗产品等公司，均注册为外国公司。^①穆罕默德六世执政初期，虽然以色列向摩洛哥的年度贸易出口额仅为数百万美元，但摩洛哥向以色列的出口额则显著增加。2000年上半年，以色列进口了价值约8.3亿美元的摩洛哥农产品和纺织品，如此庞大的数额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贸易中实属空前。

2000年9月，巴勒斯坦爆发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后，阿拉伯国家持续爆发反以色列游行示威。同年10月底，摩洛哥街头爆发了约2.5万人参加的大游行，参与者包括独立党领袖、摩洛哥首相阿卜杜勒-拉赫曼·尤素福（Abderrahmane Youssoufi）和摩裔犹太人萨法提等政治精英。压力之下，穆罕默德六世于24日关闭了位于拉巴特的以色列联络处，并召回摩洛哥驻特拉维夫的外交官。至此，摩以双边近6年的“正常关系”正式结束。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摩洛哥政府对以色列保持谴责态度，官方接触降为秘密接触。2003年6月，美国、欧盟、俄罗斯和联合国中东问题四方会议代表向巴以双方递交了中东和平“路线图”。7月30日，摩洛哥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本·伊萨（Mohammed Benaissa）和以色列外交部长西尔万·沙洛姆（Silvan Shalom）就“路线图”进行会谈，这也是21世纪以来摩以之间的第一次部长级别的会面。同年9月，穆罕默德六世接见了西尔万·沙洛姆，此次会面引发了外界对摩以关系正常化的猜测。

自2009年内塔尼亚胡再次执政以来，摩洛哥国王及政府官员与以色列之间几乎没有官方互动。2010年中东剧变爆发后5年里，穆罕默德六世将其执政的重点转移至国内问题，^②对以色列推行以秘密接触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① Michael M. Laskier, “Israeli - Moroccan Relations and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1977 - 2002”, p. 70.

^② Samuel Segev & Yvette Shumacher, “Israel - Morocco Relations from Hassan II to Muhammad VI”, pp. 54 - 59.

同时继续通过境内外摩裔犹太社区与以色列开展有限的反恐、农业、贸易等合作。2011年，摩洛哥伊斯兰主义力量正义与发展党（PJD）崛起，成为该国国内最大的政党力量，其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于反对以色列。从民众角度看，据“阿拉伯晴雨表”统计，2011年，摩洛哥民众对承认以色列的态度处于前后5年左右的最低点。在国内问题主导外交政策的逻辑下，2011~2016年，摩洛哥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关系一直处于“敌对”状态。

（四）双边关系正常化

从2016年起，由于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效果欠佳，加之2016年议会选举后组阁不力，其主导的意识形态影响逐渐式微。在此背景下，王室重新全面掌控摩洛哥内政外交的走向。外交上，摩洛哥提出了外交伙伴多元化战略，其目的是：一方面提升摩洛哥的发展竞争力，另一方面欲通过争取国际支持尽快解决西撒哈拉问题。^①在对以色列政策上，摩洛哥回到了非正式的接触政策。2016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在国际场合多次公开支持摩洛哥的西撒哈拉政策，甚至游说美国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2016年2月，穆罕默德六世指派犹太人萨姆·本·希特里特（Sam Ben Shitrit）推动内塔尼亚胡与阿巴斯之间的和平谈判。^②2017年，摩洛哥多个民间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就文化、艺术和经济等相关领域探讨合作。2019年7月，摩洛哥在巴林参加了由美国主持的“中东和平会议”，就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发表意见。2020年3月，以色列高级官员参加在马拉喀什（Marakesh）举行的反恐会议。

基于双方多年来非正式接触的历史基础，2020年12月10日，在美国政府的斡旋下，摩洛哥王室发表公报称同意恢复与以色列接触关系和外交关系，尽快重新开放两国外交联络处，扩大双边经济、技术、文化合作。在达成“协议”的同一天，美国同意向摩洛哥出售高级无人机，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并称将在西撒哈拉地区的达赫拉市（Dakhla）开设领事馆。此后，以色列商人和投资者陆续进入摩洛哥，寻求经贸合作。2021年1月19

^① Yasmina Abouzzohour & Beatriz Tomé - Alonso, "Moroc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Arab Spring: A Turn for the Islamists or Persistence of Royal Leadership?",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24, No. 3, 2019, pp. 444 - 467.

^② Raoul Wootliff, "Morocco's King Dispatches Jewish Aide to Push Israeli - Palestinian Talks", *Times of Israel*, February 15, 2016,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morocco-s-king-dispatches-jewish-aide-to-push-israeli-palestinian-talks/#gs.fk1n95>, 2020 - 05 - 10.

日，美国驻摩洛哥大使大卫·费舍尔（David Fischer）宣布，摩以两国将“很快”建立联络处。^① 1月21日，以色列与摩洛哥正式签署开通直飞航班协议。从目前双方互动情况来看，尽管摩、以建立了“双边正常关系”，但其合作内容主要以经济和文化领域为主，缺乏实质性的政治互动与合作，如元首互访。1月中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邀请国王穆罕默德六世访问以色列，但摩方以“重启巴以谈判”为条件婉拒了内塔尼亚胡的邀请。因此，就目前而言，摩以关系还属于低级别的外交关系，是一种正常化的接触关系。

总体而言，2000年10月23日至2020年12月10日，穆罕默德六世对以色列政策在形式上一直处于非正式接触关系，官方也多次表态称，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完全解决之前，拒绝与以色列达成任何外交关系。在诸多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上，摩洛哥也经常持反以态度，如2017年12月穆罕默德六世对特朗普将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表示“深深担忧”，2020年在阿联酋、巴林等国相继与以色列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的背景下，摩洛哥公开拒绝与以方签署外交协议。尽管如此，摩以双方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仍然广泛存在，尤其是在农业、军事、电影、音乐、旅游等低政治领域。^② 这一时期，犹太人、柏柏尔人、伊斯兰主义者均对摩洛哥的以色列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犹太人和柏柏尔人力主推动王室同以色列合作，而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则设法表达反以态度。因而，作为摩洛哥外交的决策者，穆罕默德六世需要在多个族群间维持平衡。在摩洛哥与以色列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后，尽管一些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表示反对，但在以西撒哈拉问题为核心的国家利益面前，摩洛哥也会打破这种族群平衡政策，欢迎犹太人的游说。

四 犹太族群影响摩以双边关系的路径

摩洛哥对以色列接触政策的核心动力主要来自全球犹太社区的强大影响力，^③ 以及摩洛哥政府、以色列政府与摩洛哥犹太社区三者的“默契合作”，

^① “Morocco, Israel Will ‘Soon’ Establish Liaison Offices”, *The Arab Weekly*, January 19, 2021, <https://theArabweekly.com/morocco-israel-will-soon-establish-liaison-offices>, 2021-1-20.

^② 笔者曾在2018年6-9月采访多位政治精英关于摩洛哥对以色列的看法。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摩洛哥与以色列的合作“可在私下进行”（Under the Table），代表人物：穆罕默德·贝尔加特（Mohammed Belghiat），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党（RNI）卡萨布兰卡哈桑区主席。

^③ 主要是摩裔犹太族群网络，也包括其他裔犹太族群。

即审时度势地开展合作，以满足各自的利益需求。总体来看，犹太族群影响摩以关系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犹太社会精英的积极游说

在摩洛哥的外交决策机制中，国王及其顾问团处于金字塔式结构的顶端，拥有至高无上的决策权，而犹太精英一直是国王顾问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犹太社会精英主要分布在摩洛哥犹太社区以及世界摩洛哥犹太社区，他们大多从事商业、艺术、公共事业以及政治活动等。

独立后第一位发挥重要作用的犹太人是担任大臣职位的里昂·邦扎康（Leon Benzaquen）^①，其成功游说哈桑二世与以色列政府达成历史上第一次接触政策。20世纪70年代，由于哈桑二世面临国内资源匮乏的困境，摩洛哥犹太社区积极斡旋以色列政府加大对摩洛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获取哈桑二世的好感。1976年，摩洛哥两位最有影响力的犹太人罗伯特·阿萨拉夫（Robert Assaraf）和安德烈·阿祖来（André Azoulay）建立了“认同与对话协会”（L'identité et Dialogue），旨在强化摩洛哥多社区或族群的谢里夫王室认同，其目的是为了搭建摩洛哥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对话平台。1978年，“认同与对话协会”举行的第一次活动主题就是关于摩洛哥犹太社区的国际论坛。^②

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工党成员拉菲·艾德里（Rafi Edri）通过其岳父摩裔犹太商人、哈桑二世顾问大卫·阿麦尔（David Amar）的关系^③促成了摩以关系史上最重要的高层会谈——哈桑二世与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峰会（在伊夫兰举办）。在哈桑二世执政的39年里，独立党的犹太成员^④对相关议程的推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哈桑二世的诸多政策中，犹太人相关政策经常会得到独立党的支持，这推动了哈桑二世对以色列的接触政策。此外，从摩洛哥国内的舆论来看，王室媒体《撒哈拉晨报》（Le Matin du Sahara）经常报道国王经济顾问、摩裔犹太人安德烈·阿祖来的公共活动（大多与以色列有关）。^⑤

① 先后担任摩洛哥第一届政府（1956—1958年）的电报与通讯部大臣和卫生部大臣。

② Jérôme Van Ruychevelt,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u Maroc envers Israël, Acteurs et Facteurs Déterminants: une Mise à Jour Théorique (2000 - 2010)*, p. 68.

③ Bruce Maddy - Weitzman, "Israel and Morocco: A Special Relationship", p. 42.

④ 独立党的犹太成员可以追溯至独立运动时期，独立党和犹太人建立的联盟。

⑤ Bruce Maddy - Weitzman, "Israel and Morocco: A Special Relationship", p. 46.

穆罕默德六世执政后，犹太社区的社会精英继续发挥着重大作用。经历21世纪初的“断交”后，摩以两国的官方联系转变为秘密接触。2003年，在摩裔犹太大拉比什洛莫·摩西·阿马尔（Shlomo Moshe Amar）的推动下，穆罕默德六世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长西尔万·沙洛姆。^① 2005~2006年，摩以关系迎来了一波小高峰。2005年11月，摩裔犹太人阿米尔·佩雷斯（Amir Peretz）继任工党主席后，受到摩洛哥政府官员的接待，随后参加了由安德烈·阿祖来主持的世界摩洛哥犹太人大会。在摩洛哥犹太社区的推动下，后来担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阿米尔·佩雷斯于2006年2月会见了穆罕默德六世。^② 事实上，在哈桑二世时期建立的工党与王室之间的政治互信也为未来摩洛哥对以色列政策定下了基调。

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其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多次访问摩洛哥，受到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接待。作为犹太人，库什纳通过国际摩裔犹太人与摩洛哥政府建立联系，试图推动摩以关系正常化，并在2020年12月取得突破性进展。摩以关系正常化的想法最早来自前摩萨德副主任拉姆·本·巴拉克（Ram Ben Barak），其名下公司与摩裔犹太人亚里夫·厄尔巴兹（Yariv Elbaz）在摩洛哥有业务往来，后者与摩洛哥外交大臣纳赛尔·布列塔（Nasser Bourita）关系亲密。2018年，本·巴拉克、厄尔巴兹、内塔尼亚胡国家安全顾问杰森·格林布拉特（Jason Greenblatt）与布列塔进行了会谈，提出了“以美国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主权换取摩以关系正常化”的方案。^③ 尽管此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以色列、摩洛哥和白宫（库什纳团队）三方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沟通渠道。2019年5月，库什纳团队访问摩洛哥时，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提出美国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主权的议题，强调该问题对摩洛哥的重要性。之后，摩洛哥外交大臣布列塔访问美国，与库什纳团队进行了多次对话。^④ 2020年12月10日，在各方的推动下，摩洛哥与以色列达成关系

^① Jérôme Van Ruychevelt,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u Maroc envers Israël, Acteurs et Facteurs Déterminants: Une Mise à Jour Théorique (2000-2010)*, p. 54.

^② Ibid., p. 55.

^③ Barak Ravid, “Scoop: Fallout between Trump and Top GOP Senator Made Morocco - Israel Deal Possible”, *Axios*, Dec. 11, 2020, <https://www.axios.com/trump-morocco-israel-inhofe-cc6e66a4-cd1b-4c08-9126-0c3e608b38fb.html>, 2020-12-22.

^④ “A la Maison Blanche, Nasser Bourita Rencontre à Nouveau Jared Kushner”, *Telquel*, 23 Octobre, 2019, https://telquel.ma/2019/10/23/a-la-maison-blanche-nasser-bourita-rencontre-a-nouveau-jared-kushner_1654999, 2020-12-22.

正常化协议。

(二)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动员

如果说社会各界精英的作用路径是通过与国王及王室建立联系，那么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于对摩洛哥社会进行群体性动员，进而达到推动和影响摩洛哥对外政策的目标。

20世纪60年代独立初期，由于摩洛哥犹太社区的影响力较小，以色列政府主要倚重以色列情报组织对摩洛哥施加影响。以色列著名情报组织摩萨德自20世纪50年代进入摩洛哥后，其主要任务是协助境内犹太人顺利向以色列移民。摩以安全合作主要基于摩萨德两任局长——伊塞尔·哈雷尔（Isser Harel）和阿米特·梅尔（Amit Meir）的个人努力。^①第一次摩以安全合作是由哈雷尔及其助手雅科夫·卡洛茨（Ya'acov Caroz）推动建立的，当时摩萨德安排了摩洛哥情报机构主要人员艾哈迈德·德里米（Ahmed Dlimi）秘密访问以色列。其主要合作成果是以色列向拉巴特派出了精干情报人员，司职培训摩方情报人员。阿米特接任摩萨德情报局局长后，摩以安全合作进一步加深。1963年，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阿米特亲赴马拉喀什会见哈桑二世，向其提供阿方和流放在埃及的反对派的情报。此后，为便于摩、以两国交流，哈桑二世还允许摩萨德在拉巴特建立拥有无线电的固定情报基站。^②随后几年，摩、以两国的合作从情报领域逐渐扩展到军事培训、投资和农业发展等领域。

在政府间机构发挥作用的同时，犹太人建立的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发展壮大，它们在摩洛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最早的犹太非政府组织是成立于1945年的摩洛哥以色列社区理事会（Conseil de la Communauté Israélite du Maroc），该组织致力于管理摩洛哥裔犹太人，且运行着一套区别于摩洛哥穆斯林社会的犹太律法。虽然该组织成立时间较早，但在其秘书长犹太人塞日·贝杜果成为摩洛哥旅游大臣之后才显现出影响力。^③1996年，罗伯特·阿萨拉夫创

^① Frédéric Abécassis, “Questions About Jewish Migrations from Morocco ‘Operation Mural’ (Summer1961): Return from Diaspora or Formation of a new Diaspora?”, *HAL*, June 2012, pp. 73 – 82.

^② Samuel Segev & Yvette Shumacher, “Israel – Morocco Relations from Hassan II to Muhammad VI”, p. 53.

^③ Jamaâ Baida, “La (ré) Appropriation de la Dimension Juive Comme Composante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Marocaine, in Ariel Danan, Claude Nataf, dir., *Juifs au Maghreb Mélanges à la Mémoire de Jacques Taïeb*, Paris: Éditions de l’Éclat. 2003, pp. 200 – 208.

立了摩洛哥国际犹太人研究中心 (Centre International de Recherche sur les Juifs du Maroc)。三年后, 罗伯特又建立了世界摩洛哥犹太人大会。这类非政府组织的成立, 搭建了摩洛哥与以色列的沟通渠道, 减少因信息不畅通带来的战略误判, 且为犹太社区对摩洛哥政府进行游说提供了合法平台。

(三) 美国犹太集团的间接推动

自 1786 年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以来, 美国一直将摩洛哥视作重要的国际盟友, 原因在于: 其一, 摩洛哥是美国在西亚北非地区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 主要表现为摩洛哥在冷战时期是抵抗苏联共产主义的重要堡垒, “九一一”事件后则作为全球反恐的重要合作者。其二, 在美国看来, 摩洛哥是西亚北非地区出色的“民主”推广者。自独立以来, 摩洛哥各界政府均将“民主化”作为改革目标, 赢得了美国社会的认可。其三, 摩洛哥是西亚北非地区对以色列敌意最少的国家。

就美国而言, 其外交政策受国内犹太人利益集团的影响; 从摩洛哥角度看, 美国一直是摩洛哥最重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国。因此, 犹太集团 (代表以色列利益)、美国 (受犹太因素影响) 和摩洛哥 (求助于美国) 三者形成了如下的影响关系: 犹太社区利用自身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力, 向美国政府施压; 美国则利用摩洛哥对其援助和外交支持需求的依赖, 影响摩洛哥对以色列政策。

独立初期, 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爆发了“沙地之战” (Sand War), 继位初期的哈桑二世深知美以之间的特殊关系, 遂主动接触以色列, 获得了来自美国的关键性军事援助。1966 年, 摩洛哥成为美国对外援助流向居前五位的国家, 受援额高达 4 亿美元。^① 20 世纪 80 年代初, 由于摩洛哥与“波利萨里奥阵线”战事紧迫, 为继续获取美国支持, 哈桑二世积极促进中东和平事业的发展 and 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此外, 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爆发经济危机, 摩洛哥开始寻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 而这两大组织长期由西方尤其是美国把持。这也部分解释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 摩洛哥对以色列开展正常化接触政策的原因。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全球伊斯兰主义扩散, 一方面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

^① Azzou El - Mostafa, “Les Relations entre le Maroc et les Etats - Unis: Regards sur Période 1943 - 1970”, *Guerres Mondiale et Conflits Contemporains*, 2016/1 N°221, p. 112.

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也开始危及众多阿拉伯政权的生存。在此状况下，摩洛哥更需要美国的支援，而这种支援的隐性条件之一是“积极”发展对以关系。美国对摩洛哥的支援包括建立自由贸易区、指定摩洛哥为非北约盟友和提供经济援助等。

摩洛哥犹太人在施压美国政府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摩洛哥犹太人与美国犹太集团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平托家族（Pinto Family）。该家族起源于摩洛哥南部城市索维拉的卡拉比派拉比海伊姆·平托，平托家族后代约什亚胡·平托（Yoshiyahu Pinto）^①于20世纪70年代离开摩洛哥后，在纽约成为著名的美国以色列社区拉比，拥有信徒达25万人。平托家族为企业家、政治家、体育运动员等信徒提供服务。^②基于上述全球人际网络，平托家族为美国政界和摩洛哥犹太社区建立了联系。

犹太社会精英、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美国犹太集团分别在王室、国内和国际三个层面影响着摩洛哥的对外政策。王室作为摩洛哥外交的绝对核心，其政策制定多受国王顾问团的影响。长期以来，摩洛哥王室有吸纳犹太人进入国王顾问圈的传统。因此，在对以色列政策上，犹太社会精英是摩以双边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其作用也最大。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犹太社区通过平台的力量对摩洛哥的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施加影响。哈桑二世时期，这一因素在促进摩以关系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穆罕默德六世时期，在国际反恐的新形势下，两国情报、安全组织的互动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美国一直是影响阿拉伯国家对以政策的重要因素，摩洛哥也不例外。对摩洛哥而言，美国犹太集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摩裔犹太人通过借助美国犹太社区的力量满足摩洛哥国际需求，对摩洛哥形成“软制衡”，进而影响其对以色列政策。由于美国是独立后摩洛哥在全球的重要盟友，亦是摩洛哥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援助者。因此，摩洛哥在获取美国犹太集团援助的同时，在对以色列政策上也会参考美国的意见。可见，作为全球性跨国族群的犹太人，其族群动员在影响所在国、以色列、美国等外交关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① 2018年约什亚胡·平托在以色列因贿赂问题被判刑10个月，回到摩洛哥后，担任摩洛哥以色列社区理事会拉比。See Sophie Lamberts et Thomas Savage, “Communauté Juive, la Guerre des Clans”, *Telquel*, N°857, Du 10 Au 16 Mai 2019.

^② Aomar Boum, “AMoroccan Kabbalist in the White House: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red Kushner and Moroccan Jewish Mysticism”,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22, No. 2, Spring/Summer, 2017, pp. 150 – 152.

尽管如此，犹太人在摩以双边关系中的作用仍具有局限性。摩洛哥境内的犹太社会精英数量有限，影响范围较窄，对王室的影响也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作用力。无论在摩洛哥政府内部还是在民间社会，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依然占据上风，该群体是摩洛哥对以色列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摩以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阻力”。总体来看，犹太人的作用在巴以关系整体缓和的环境下易得以发挥，而在巴以关系紧张局势下具有不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犹太人能够力促摩、以长期接触，以及摩以关系正常化的背后逻辑还在于摩洛哥国家利益的主导作用，尤其是国家政治安全（政权生存）、领土安全（西撒哈拉问题）等核心政治议题的推动作用。

五 结语

阿拉伯剧变以来，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政策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实行“三不政策”，即不承认、不接触、不建交，这类国家以巴勒斯坦、黎巴嫩、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为主；二是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这类国家包括埃及、约旦、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三是实行“接触政策”，这类国家主要有突尼斯、阿曼、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吉布提和索马里等国。从目前阿拉伯—以色列关系的大变局来看，从接触到建交的转变受阿拉伯国家国内政治和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对于同时受到内政与外交掣肘的国家，往往更倾向于维持现状。总体而言，当前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处于正常与敌对之间的“接触状态”。在与以色列有正常外交关系或“接触政策”的阿拉伯国家中，犹太人与当地政府均有着友好关系；相反，对于坚持“三不政策”的阿拉伯国家，犹太人数量极少甚至为零，且曾与当地政府关系较为紧张。因此，犹太人因素是窥视当前阿以关系的重要维度之一。

长期以来，阿以关系是中东局势发展的重要晴雨表。作为全球最大的跨国族群，犹太人及犹太社区在推动阿以关系走向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与移居国政府、美国和以色列均有着紧密、友好的关系。例如，在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达成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前，双方已经开展了较长时间的非正式秘密接触。这种秘密接触关系最早是由犹太人推动的，主要包括本地犹太商人和美国知名犹太机构的拉比。近10年来，在犹太人的帮助下，

以色列官员、情报特工、防务与安全公司频繁地秘密访问阿联酋和巴林。^①这也是促进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达成外交关系的重要基础。由此可见，犹太人的跨国互动将是新时期阿以关系取得新进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摩以关系改善是阿以关系发展的一种独特模式，主要表现在：第一，作为阿拉伯国家，摩以关系长期维系着接触状态，其产生的效果是：一方面，能使摩洛哥通过全球摩裔犹太社区获取国家发展所需的战略资源；另一方面，能够平息摩洛哥民间社会中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减少对君主政权的威胁。第二，犹太因素是促进接触状态的重要因素，并大致符合少数族群影响外交政策的一般理论范式，即利益集团论和跨国族群联盟论。从理论上讲，犹太社会精英和以摩洛哥社区为主的非政府组织均是利益集团的组成部分，而美国犹太集团的间接推动可看作是摩洛哥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跨界合作的结果。第三，不同于犹太人在西方国家的游说场景——媒体、学术和政治三重空间，摩洛哥犹太人的活动空间狭小，主要集中于商界和政界等上层社会，因此高层之间的秘密接触是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第四，由于巴以问题具有敏感性，摩洛哥犹太人的作用路径选择具有时机性的特点，即根据国际、地区和摩洛哥国内形势开展不同程度的游说。第五，摩以双方在安全议题（反恐）、发展议题（农业）和文化议题（音乐、艺术）的合作是“接触政策”的重要体现，这对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改善关系亦有重要启示。

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族群政治一直是国内政治治理的重要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族群政治问题往往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即易受到国际和地区思潮的影响。尽管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数量非常少，但其影响力不可小觑。作为阿拉伯国家族群的一部分，犹太人也是阿拉伯国家族群治理的重点之一。从犹太人与摩洛哥外交政策互动来看，摩裔犹太群体通过犹太社会精英、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向摩洛哥王室游说，以维持摩洛哥与以色列的接触政策，同时王室也会通过犹太群体获取以色列的公开或秘密资助，投入与产出呈正比。纵观中东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寻找更好地处理少数族群

^① 例如，2001年，以色列前内阁成员埃弗拉姆·斯内赫（Efraim Sneh）回忆道：“我是沙龙总理的内阁核心成员，我去阿联酋的目的是建立双边关系，并举行了非常高级别的会议。” See “Trailblazing Jews of UAE are Paving Path to Peace”, *Ynetnews*, October 29, 2020, <https://www.ynetnews.com/article/HkTJd1SQD>, 2020-09-23. 2018年，时任体育部长雷格夫（Miri Regev）陪同以色列国家队前往阿布扎比参加国际柔道联合会（International Judo Federation）大满贯赛事。

的办法。摩洛哥的经验表明，当对某一族群的预期投入能实现更多的回报时，政府就会倾向于迎合政策，而当预期投入可能出现收益低或者风险系数大的时候，政府的政策则偏向于不作为或收紧倾向。

The Jewish Factor in the Morocco's Contact Policy Towards Israel

Zhang Yuyou

Abstract: As the main political agenda of multi-ethnic countries, ethnic minority factor is one of the domestic roots of foreign policy making. Historically, Jews were one of the main ethnic groups in Morocco. As a minority in Morocco, the Jews have historically established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local society, and the “Dhimma” status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Jewish community's participation of Moroc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Moroccan independence in 1956, Morocco's policy toward Israel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limited contacts, normalized contacts, secret contacts,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each of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oyal family and the Jewish community. The Jewish community lobbied the Royal family through Jewish elit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o as to change Morocco's foreign policy toward Israel. The Moroccan King received Israeli strategic resource assistance via the Jewish community while balancing the risks and benefits. A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cross-border communities, Jew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future Arab-Israeli relations.

Key words: Morocco - Israel relations; contact policy; minority group; Moroccan Jews; Palestine - Israel conflict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